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南回归线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南回归线

〔美〕亨利·米勒 著
郝 伟 译

随着人的生命消亡，原本存在的万事都将不复存在，一切混乱也了结于此。人生伊始，便除了混乱别无他物：一种液体围绕在我的周围，经我嘴而被吸入肺腹。在我下面，接连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生气盎然，风平浪静；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混乱。对于任何事物，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以及悖论。我最坏的敌人是我自己。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事情我是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无忧无虑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不到斗争是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添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在我的周围，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都滑稽可笑。即使不是失败者，也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尤其是那些成功者。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出于同情心。这也许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助人时，我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需要自助使然。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不起作用；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经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种事情令我作呕。上帝需要我，但我不需要上帝。我对自己说，假如有一个上帝的话，我会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往他的脸上啐唾沫。

令人恼恨的是，第一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

慈、慷慨、诚实可靠。也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便如此，也是因为我无所用心：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诚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做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及任何事。相反，我有的只是同情，同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最初，我就肯定是有意识地把自己训练得不过分需求任何东西。最初，我是独立的，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呈现。我拒绝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情自由地作为，自由地授予。对于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的事，我退避三舍。我的独立形式便是这样采取的。我是腐朽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不是奶，而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浸透了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毫不在乎；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而我却根本不介意。尚在襁褓中时，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何种原则？无用的原则。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一点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人，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就会拒不承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与众不同，这是无法改变的。我长大后，听说他们把我从子宫里弄出来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对此我十分谅解。出来做什么？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地方？在这个舒适的乐园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给你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河谷里的冰雪，玻璃窗上的寒霜，以及厨房湿滑的绿墙上的液珠。人们误称温带的地方，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天生就是白痴，天生就是懒虫，天生就是胆小鬼。我长到十岁左右，从不知道有“温暖的”国家，有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

方，在那里不必诚惶诚恐却又佯装这能令人振奋精神。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劳作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子孙的时候，他们便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光荣——事实上，这什么都不是，只是有关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来源于他们。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他们清洁极了，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窗；从未梦想过恣意地跃入黑暗。吃完饭后，迅速洗净盘子，放入橱柜；报纸读完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到一边的架子上；衣服洗完后，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是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会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与世界的呻吟相互应和，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有过要炸掉这座桥的想法。

经常搜寻谴责他们、更谴责我自己的理由，这使我痛苦，但却未停止搜寻，皆因我在许多方面也与他们类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已经解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我无所长进，甚至更糟，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然而却始终无法改变我的生活。追忆我的一生，我仿佛觉得我从未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是处于别人的压力之下。在人们的眼里，我是一个爱冒险的家伙，这真是太离谱。我的冒险都是外因促使而落到我头上，不得已而屈就。我有着傲慢而得意洋洋的北欧人的真正性情，他们从没有一点冒险意识，但是却踏遍大地，将世界翻了个个，遍地留下遗迹与废墟。躁动的灵魂，但不是冒险的灵魂。这些灵魂痛苦地挣扎，无法在现实之中生活。他们都是可耻的懦夫，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唯一伟大的冒险是内在的，向着自我，因此，无论空间、时间，甚或行为，都无关

紧要。

几年之内，我总会有一回身处做出这种发现的边缘，我又总是以独特的方法，避开这问题。我如果试着想起一个好的借口，我就只能想到环境，想到我知道的街道和住在这些街道上的人。我记不起住在这样一条街上的哪个人，或美国的哪条街道，能引领一个人走向自我发现。我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街上经过，没有一处使我如在美国那样感到堕落与卑贱的。我想，美国的所有街道都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藏污纳垢之地，一个精神的污水池，在里面，一切都被吮掉排尽，只剩下一堆恒久的臭狗屎。在这污水池之上，劳作的鬼魂挥舞着魔杖；宫殿与工厂鳞次栉比地凸现，什么化工厂、火药厂、疗养院、监狱、钢铁厂、疯人院等等。整个大陆便是一场恶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正产生着。我是置身于财富与幸福的最大汇集地之中的一个独立的实体，我从没有碰到过一个真正富有或真正幸福的人。不过我知道，我不幸福，不富有，不合拍，生活不正常。这是我惟一的安慰，惟一的欢乐，但这还差得远。假如我公开表示我的叛逆，假如我为此而蹲牢房，假如我烂死在监狱里，或许更能使我平和心情。假如我像疯狂的莱佐尔戈斯兹那样，杀了某个好总统麦金利，杀了某个像他一样从未对人有一丝伤害的微不足道的良民，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更好。因为我从心眼儿里想杀人：我要看到美国被毁灭，从上到下，得铲除彻底。我要眼见这一切的发生，纯粹是出于报复，作为一种补偿——对施于我和像我一样的其他人的罪恶的。那些与我相同的人从未能大声疾呼，表达他们的仇怨，他们的叛逆，他们的合理的肆杀欲望。

我作为一个邪恶产物，来自于一块邪恶土地上。如果自我

南 回 归 线

能够永生，那么，我所谓的这个“我”早就被灭掉了。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就像一种发明，可是无论我想像发生了什么，都确实真的已经发生，对我来说至少是这样。历史对此不会认同，因为我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没起任何作用，但是即使我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狭隘的、恶毒的，即使我是个谎言编造者，一个投毒者，真理就是真理，不得被盲目接受。

还有那些发生的事情……

所有发生的事情在其存在意义时，皆具有矛盾的性质。直到我为其写下这一切的人出现以前，我都想像外面某处，在生活中，就像他们所说——存在着对一切事物的诠释。当我碰见她时，我想，我正在抓住生活，抓住我可以咬住的某个东西，然而对生活的把握我完全失去了。我伸手去抓我要依附的东西——但一无所获，而在伸出手去的时候，尽管孤立无援，再努力去抓、去依附之时，我却看到了我并未寻找的东西——自己。我醒悟了，我一生的愿望并不是活着——假如别人称在进行着的事为活着的话——而是自我揭示。我理解到，我对活着从来没有一丝兴趣，只是对正做的事，我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同步，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对真实的东西我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也无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只有想像中存在的东西，为了活着而每天窒息了的東西。我今天死或明天死，对我并不重要，也历来没有重要过，但是直到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仍然不能说出那些让我思考和感觉的东西——这使我苦恼，使我愤恨。从儿时，我便能看到自己与这个幽灵赛跑。除了这种能力、这种力量外，我别无所求，别无所好。其他的一切全是谎言——一切我所做所说的都与此无涉。我一生的绝大部分便是如此。

正如他们说的那样：我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人们认为我沉稳、高洁，或者快乐、莽撞，或者认真、真诚，或者粗心大意、我行我素。这一切的混合体便是我——此外，我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种没有人怀疑的东西，我自己无法怀疑这种东西。在我还是六七岁的孩子时，我常常坐在我祖父的身边，他一边做着缝纫活，一边听我给他读书。他那些时候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他把滚烫的熨斗压在大衣缝口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朝窗外望。我记得他站在那里时脸上梦一样的表情，这要比我所读的书的内容、我们进行的交谈、或者我在街上玩的游戏要记得更清楚。他梦见了什么，是什么使他神不守舍？我常常奇怪，我还没有学会怎样来做白日梦。在那时以及任何时候，我都清楚。他的白日梦使我入迷。我知道，他正在做着的事同他没有任何关系，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中的任何人，他很孤独，正因为孤独，自由是属于他的。我从不孤独，尤其当我独自一人时，更不孤独。我总是好像有人陪伴着：如同一块大奶酪上的一小点儿，大奶酪便是世界，我想。虽然我从未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然而我明白，我从来不单独存在，从来没想到自己像大奶酪一样。就算我有理由认为自己很不幸，有理由抱怨和痛哭，我都总是幻想自己加入了一种共同的与普遍的不幸。在我哭泣时，全世界都在哭泣——我是这样想的。我很难得哭泣。通常我很愉快，放声大笑，过得很快乐。我过得很快乐是因为，如我以前所说，任何事情我都不在乎。如果事情从我这儿出了什么毛病，那么它们在哪儿都要出毛病，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事情常常只是在人们过分关注时才出毛病，在老早以前我就印象深刻。以我的小朋友杰克·劳森的情况为例。整整一年，他卧床受病痛煎

熬。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人们是这样说的。当初我还为他感到难过，时不时到他家去打听他的情况；但是在一两个月之后，我变得对他的痛苦漠不关心。我对自己说，他应该尽快死去。我想，亦这样做，就是说，我尽快忘记他，将他撇给他的命运。这是我大约只有十二岁的时候，我记得我还特别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我记得那次葬礼——这件事很不光彩。人们在那里，亲戚朋友们都像有病的猴子一般大哭大叫，聚集在棺材周围。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揍痛了我的屁股。她是一个少有的虔信宗教的人物，我相信，是基督教派，虽然她不信疾病，也不信死亡，但是她如此大哭大叫，吵得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当然不是她的可爱的杰克！他正冷冰冰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是叫也叫不应了。他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感到痛快。我不在这上面浪费任何眼泪。我不能认为他过得更好，因为这个“他”毕竟消失了。他走了，也带走了他忍受的——以及他无意中加于别人的痛苦。我对自己说：阿门！随后，显得有点儿歇斯底里，我放了个响屁——就在棺材旁。

这种过分一本正经——我记得它对于我来说只是在我初恋的日子里才有所发展。即使在那时候，我也还是不够一本正经。要是我真的一本正经，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写这件事了：我会因一颗破碎的心而死去，抑或是为此而被绞死。这是一种糟糕的经验，因为它教我如何虚伪对人。它教我在不想笑时笑，在厌烦工作时工作，在没有理由活着时活着。甚至在我已经忘却了她时，却将那种做违心之事的伎俩保留着。

正像我先前所说，我自人生伊始便一派混乱，可有时，我离混乱的中心已如此之近，以至于我身边的事物没有发生爆炸

倒是一件很使人惊讶的事情。

把一切归咎于战争，是人们的一贯作法。我说，战争与我，与我的生活无关。当别人全在为自己谋取舒适位置时，我却接受着一个又一个糟糕透顶的工作，靠它们我从来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消费。我被解雇几乎同我被雇用一样快。我才华横溢，却引不起人们的信任。我到任何地方，都煽动了不和——不是因为我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由于我像探照灯一样暴露了一切事物的无用与愚蠢。此外，我不会拍马屁。这基本上是我的特点。当我谋职时，他们会马上识别出，我实际上并不在乎是否得到职位。当然，我往往得不到职位，但是久而久之，寻找本身成了一项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消遣。我会上门提出几乎任何要求。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就我所言，不比单纯的工作更坏。我是自己的老板，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但是我只导致自己的毁灭，自己的破产——不像其他老板。我并非是一家公司，一个托拉斯，一个州府，一个联邦，一项跨国策略——确切地说，我只能赞同说我更像上帝这种说法。

2

情况持续着，没有什么变化。大约从那场持久的战争直到……啊，直到我陷入困境的那一天。真正走投无路地想要一个工作的那一天终于到来。我立即决定，哪怕这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次的工作，比如送信人，我也干。快下班时，我走进了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做好了对付一切的准备。我刚

从公共图书馆来，腋下夹着有关经济与形而上学的书。令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是，我请求做这项工作时遭到拒绝。

那个拒绝我的家伙是一个管电话交换机的矮个子。他也许把我当成了大学生，尽管我早就离开了学校，从我的申请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甚至在申请表上填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为自己增添了几分光彩。很显然，这一点并未受到注意，要不然，就是这个拒绝我的矮人对这一点产生了怀疑。我愤怒了，因为我一生中就认真了这一回，我感到格外愤怒。我不仅认真，还忍气吞声，压下了傲气，这种傲气在以特有方式释放出来时是很盛气凌人的。我妻子当然同往常一样，斜眼看人，冷嘲热讽。这是做做样子，她说。我上床睡觉时一直恼恨这件事，整夜愤恨不已，无法入眠。我有妻小要养活的事实并不太使我心烦；人们不会因为你有妻小要养活，就给你工作，对这些我再清楚不过了。不，使我恼火的是他们拒绝了我……亨利·米勒，一个有能力的优秀人才，“他”只是请求得到世界上最低贱的工作。这使我怒火中烧，无法克制。我第二天一大早便起床，刮好胡子，穿上最好的衣服，匆匆忙忙去赶地铁。我直接去了电报公司的总部办公室……直奔二十五层或总裁、副总裁有他们小办公室的某个地方去见总裁。当然，总裁不是不在城里，便是太忙而不能见我，可是我并不介意见副总裁或是他的秘书。我见到了副总裁的秘书，一个聪明而替人着想的小伙子。我灌了一大堆语言——往他耳朵里，表现得很机敏，不过分强硬，但是始终让他清楚，我不会像皮球一样被容易地踢出。

见他拿起电话打给总经理之时，我想，他只是在装模做样，只是以老一套来将我从这里踢到那里，直到我自己受不了

为止。不过，我一听到他谈话，看法就改变了。当我来到设在非商业区另一幢楼内的总经理办公室时，他们正等着我。我接受了递过来的一支雪茄，坐到舒适的椅子上。此人似乎马上就对事情十分关心。他要我把一切都对他说，直至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他毛茸茸的大耳朵竖起，来抓住一点一滴信息，以便有利于他在头脑里形成对这事或那事的看法。我已经有点偶然地真正变成一种工具，在为他服务，我懂得这点。我被他哄得按他的设想来为他服务，随时都在窥测着风向。在谈话的进行中，我注意到他对我越来越兴奋。终于有人对我流露出一点儿信任啦！这一切就是我开始干我最喜爱的行当时所要求的。因为，在寻找了多年工作以后，我变得很老练；我知道不该说什么，还知道暗示什么，影射什么。一会儿，总经理助理被叫进来，让我讲故事给他听听。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我明白了，海莫——总经理称他为“那个犹太小子”——篡夺了特权。显然，他没有权力，假装是人事部经理。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海莫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总经理的印象里声名狼藉，而且在同总经理作对的副总裁忒利格先生那里也名声不佳。

也许“犹太脏小子”海莫应该为送信人员里犹太人所占的高百分比负责。大概海莫实际上就是在人事部——他们称为“落日处”——负责雇人的那个人。我想，现在对于总经理克莱西先生来说，是把某个彭斯先生撤下来的大好机会。他告诉我，人事部经理彭斯先生现在已干了大约三十年，显然对于干这项工作正在失去兴趣。

开了有几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前，克莱西先生把我拽到一旁，对我说，他计划让我当劳动部门的头，但是在任职以前，

他打算请我先做一名特别信使，这对我是有好处的。既是一种特殊的帮忙，又是一种学徒。我将领取人事部经理的薪水，可是是从一个单立的帐户上给我付钱。总而言之，是叫我从这个办公室游荡到那个办公室，去看看所有人进行的事情在如何运转。关于这个问题我得经常打打小报告。他还建议，过上一阵子就私下到他家里去一次，聊一聊在纽约市的宇宙精灵电报公司许多分支机构的状况。换种说法，就是让我当几个月密探，然后我才可以上任。可能有一天我还会当总经理，或者副总裁。这个机会很诱人，尽管它处在大量马粪中间。我说干。

我坐在“落日处”，是在几个月之后，如同恶魔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解雇。上天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艺儿从根本上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是对物力、人力、精力的耗费，是一出夹杂着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丑陋的滑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解雇人、雇用人的工作，还有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接受。假如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子，我便不雇瘸子。假如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通通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他们指示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必须是以一种他们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何时出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风头过去，但是我保证首先要他们一大笔钱为此而付出。整个体制都坏死了，它卑鄙下流，违背人性，腐败到极点，也繁琐到极点，假如没有一个天才，就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具有体贴与仁爱之人情了。我面对着整个腐朽的美国劳动制度，它已从头烂到脚了。我很多余，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实际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每个人都在被利用——被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强权所利用，

雇员被高级职员所利用等等。在我的“落日处”的小小位置上，整个美国社会都可以鸟瞰。这如同电话簿里的一张纸。按字母号码、顺序、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可是当你进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部分时；当你考察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考察他呼吸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时机时，你就看到了如此卑劣、如此肮脏、如此下贱、如此绝望、如此愚蠢、如此可悲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见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见到全部美国生活——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统计、艺术、病理学等各方面。它看上去就像一只蔫鸡巴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事实上比这还糟，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像鸡巴的任何东西了。也许过去这东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家什，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感，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爬满虫子的奶酪还要腐烂。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包括现在，也许还更糟一点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的冲天臭气。

在瓦莱丝佳出现时，我已经雇佣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我在“落日处”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拦的污水沟渠，臭不可闻。我才往里探了一下身子，便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种味道，首先，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我撵走的那个人，就伤心而亡。他硬挺的时间也不短了，正好到我闯进来，他就一命呜呼了。事情来得如此快速，我都没有来得及产生内疚感。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从未间断的大混乱便开始了。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经常迟到——这地方就已挤满了申请人。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跑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莫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纠缠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

得及摘下帽子，就回答了十几个电话。我桌上同时响起来的有三部电话机，甚至在我坐下来工作以前，它们就已经吵得我憋不住尿了。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海莫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交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点，直坐到下午六点，支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便是从一个营业所调到另一个营业所去干一天或一天里干几个小时的送信人员。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是满的；海莫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着堵缺口，像个疯子一样。假如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可是，第二天，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或者更糟。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工。稳定的人手把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工一星期挣四五十美元，有时候六十至七十五，有时一星期挣一百美元之多，就是说，他们比职员挣得多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一星期挣十美元都很难。有些人干了一小时就放弃了，常常将一捆电报扔进垃圾箱或扔进阴沟里。无论他们何时退出，都会立即要求付给他们报酬，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计制度非常复杂，至少要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出一个送信人赚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一直到我嗓子沙哑。我不久便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须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子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假如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开除又被雇用了多次。一些人认为这是寻找另一份工作的巧妙方法，因为工作需要，他们有机会来到他们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的办公室。幸好有个可信赖的考麦克戈文，他看门、分发申请表格，并有照相机似的眼力。还有我身边的那些大本子，

经受了考验的每一个申请者的履历在里面。这些大本子酷似一种警察局画满了红色墨迹的档案，表证这样或那样的失职。我的处境从证明材料来判断很麻烦。每两个名字中就有一个同偷盗、诈骗、争吵或呆傻、性倒错、弱智等有染。“当心——某人是癫痫病患者！”“不要这人——他是黑鬼！”“当心——某人曾在丹纳摩罗住过——要不就在辛辛监狱。”

如果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那就谁也休想被雇用了。我必须快速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档案或我周围那些人的话来决断。要鉴别一个申请者，有许许多多要考虑的细节：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们全接受下来，而且要行动迅速，因为在短短一天中，你也只能雇这么多，即便你是杰克·鲁滨逊那样的快手，也没有可能再多。怎么也是不够的，无论我雇多少，第二天一切又从头开始。我明白，有些人只会干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样雇他们。这个体制从头到尾没有对的地方，但我无权评价它。我的职责就是开除和雇用。我处于一个急速旋转的转盘中心，没有东西能停下来不动。我们需要的是技师，可是上级的逻辑是，机械部分没什么毛病，一切都很正常，只是具体事情上暂时出了点儿小毛病。事情暂时出现的问题，就造成偷窃、癫痫、痴呆、破坏、犹太人、妓女、黑鬼，等等。有时候还有罢工与关闭工厂，因此，根据这个逻辑，你就得拿一把大扫帚，去把马厩打扫干净，要不就拿棒槌与枪炮，打得那些可怜的白痴懂得，再不要为那种认为事情在根本上出了毛病的想法而痛苦。时常谈论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是让一个小团体唱唱歌，也许甚至时常发点儿奖金也是没有坏处的，这是在问题正可怕地恶化，说好话已不起作用之时。但是总体上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不断雇用与解雇；只要有弹药，有兵，我们就冲锋，就不

断扫荡各条战壕。在此期间，海莫不停地吃止泻药——足以把他的屁股撑破，如果他曾经有过屁股的话，但是他不再有一个屁股了，他只是想像他在上厕所，他在坐着拉屎也只是想像。实际上这个废物是在发呆。有许多营业所要照管，每一个营业所都有一群送信人，如果不是他们假设的便是虚幻的，但无论他们是假是真，确切或是不确切，海莫都得从早到晚把他们差来差去，而我则堵窟窿。其实这也是凭空想像的，因为当一名新手被派到一个营业所去，谁又能说准他会今天到那里，还是明天到那里，或是永远也到不了。里面有些人在地铁里或摩天大楼底下的迷宫失去方向感；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因为穿着制服免费乘车，或许他们还从没享受过整天在高架铁路线上乘来乘去的乐趣呢。当中有些人出发去斯塔滕岛，却到了卡纳尔西，不然就是在昏迷中被警察带回来。有些人忘了他们住在哪里，彻底消失了。我们雇用有些人在纽约工作，却在一个月后出现在费城，似乎这很正常，是天经地义的。一些人向目的地出发，却在中途决定去卖报纸，然后他们便会穿着我们发给他们的制服出现于街头，卖着报纸，直到被发现。一些人则受某种怪异的自我保护意识的驱使而径直去了诊断病室。

海莫早晨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削铅笔；无论打来多少电话，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说，他如果不是一下子削好铅笔，那就再也没有时间削了。其次是看一看窗外，了解天气怎样，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旁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并在其中写上天气预报。他对我说，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假如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